

# 明代辽东与山东的关系辨析

## ——兼论地方行政的两种管理体制

杜洪涛

辽东都司与山东布政司的关系是与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相关的重要问题。本文认为所谓“原系一省”指洪武年间辽东半岛曾经存在过的州县归山东行省及洪武九年之后的山东布政司管辖，卫所体制的辽东都司从未隶属于州县体制的山东布政司，同时揭示了明朝管理辽东都司非常规行政区划的实际运作。进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明代地方州县与卫所两种不同管理体制。

**关键词** 明代 辽东都司 山东布政司 地方行政管理体制

作者杜洪涛，1970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北大街126号，邮编100871。

辽东都司与山东布政司的关系牵涉到明代地方行政是否可以划分为两种不同体制的重要问题，<sup>①</sup>明史研究者因此颇为重视。1986年李健才指出明代东北的都司、卫所与一般的同类机构不同，是一种“军政合一的地方政权机构”。<sup>②</sup>1991年丛佩远提出了与李健才针锋相对的观点，认为辽东都司并非“独立设治”而是隶属于山东布政司。<sup>③</sup>此后，荷见守义与张士尊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丛佩远的观点提出质疑。<sup>④</sup>笔者认为，李健才的观点大体不误，但没有就此展开论证，也未回应丛佩远的不同意见；丛佩远提示研究者不能不加论证地认为辽东都司是独立的、军政合一的行政区划值得肯定；荷见守义与张士尊的贡献在于部分修正了丛佩远的观点，但是对于丛佩远引以为证的辽东、山东“原系一省”与“名为一省”的史料没能进行深入分析。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对此做进一步探讨。

### 一、“原系一省”考辨

在明代文献中，不乏涉及辽东都司与山东布政司关系的记载。这些史料大体可以分作辽

① 顾诚指出明代疆土管理体制由军事与行政两大系统组成，详见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② 李健才：《明代东北》，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页。

③ 丛佩远：《试论东北地区管辖体制的几个特点》，《北方文物》1991年第4期。

④ [日] 荷见守义：《明代遼東統治體制試論——山東布政司との関わりをめぐる》，《人文研纪要》第37号，2000年；[日] 荷见守义：《明代巡按“遼東”考》，《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第34号，2006年；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试析》，《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

## 明代辽东与山东的关系辨析

东曾经隶属于山东、辽东在名义上隶属于山东、辽东隶属于山东三类。正如丛佩远所指出,明代史料中有辽东“以青齐—海之限,属之山东”<sup>①</sup>的记载,但是史料中同时存在着将辽东都司称为“辽东省”的记载。如成弘年间(1465—1487),辽东著名理学家贺钦称“往年,东人(按:即辽东人)屡欲展辽东省”。<sup>②</sup>万历十八年(1590)《重修辽阳城西广佑寺宝塔记》有“辽东一省文武职衔”的文字。<sup>③</sup>万历四十八年(1620),山东巡抚王在晋有言:“以贵部新加辽饷,原为贍辽东省。”<sup>④</sup>所谓“省”指布政司。上述三条有关“辽东省”的记载说明不能仅以第三类史料为据推断明代辽东都司始终隶属于山东布政司。

有关辽东与山东“原系一省”的明代史料如下:(1)成化十二年(1476)左右,明代著名学者丘浚称“辽左旧隶山东藩司”。<sup>⑤</sup>(2)嘉靖三十七年(1558),蓟辽总督王忬曰“臣谨按,山东、辽东旧为一省”。<sup>⑥</sup>(3)嘉靖三十七年,辽东巡按周斯盛云“国家建置之初,以之(按:指辽东)隶山东”。<sup>⑦</sup>(4)万历元年(1573)左右,兵部右侍郎汪道昆言“查得辽东原隶山东、同省”。<sup>⑧</sup>(5)万历十五年(1587),辽东巡按李思孝曰“辽东一镇旧隶山东”。<sup>⑨</sup>(6)万历年间,辽东巡抚顾养谦言“辽东故航海属山东”。<sup>⑩</sup>(7)万历四十四年(1616)山东巡按御史王雅量云“国初旧制,山东、辽东原系一省”。<sup>⑪</sup>(8)明季,兵部尚书申用懋称“辽(东)故沿海属山东”。<sup>⑫</sup>(9)《皇明从信录》载:“辽东原属山东,士子赴试艰远。嘉靖甲午,改附顺天。”<sup>⑬</sup>

丛佩远依据史料(7)作为明代辽东都司始终隶属于山东布政司的证据,遭到了荷见守义批评,认为史料(7)是自晚明追溯明初的情况,不能将其视作明代辽东都司始终隶属于山东布政司的“铁证”。非常遗憾的是,荷见守义虽然认为史料(7)表明至少在史料形成的万历四十四年辽东已经不再隶属于山东,<sup>⑭</sup>却未能进一步讨论辽东都司是否曾经隶属于山东布政司;如果两者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那么有关辽东、山东“原系一省”的记载当作何解释;如果辽东与山东在明代确实存在过某种隶属关系,那么这种隶属关系起于何年,迄于何年等问题。

笔者认为上述史料的作者值得信赖,需要强调的是史料(4)时任兵部侍郎的汪道昆所谓“查得辽东原隶山东、同省”,表明当时存在着能够证明辽东曾经隶属于山东的档案或其

① 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卷2《辽海东宁道题名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贺钦:《医间先生集》卷1《言行录》,新文丰出版社1989年版。

③ 邹宝库辑注:《辽阳金石录》,辽阳市档案馆、辽阳博物馆1994年版,第12—13页。

④ 《海运摘钞》卷8《八十六》,新文丰出版社1997年版。

⑤ 丘浚:《琼台诗文会稿》卷11《赠王郎中往辽东序》,新文丰出版社1997年版。

⑥ 《明世宗实录》卷460,嘉靖三十七年六月己卯。

⑦ 章潢:《图书编》卷44《辽东海道》,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⑧ 汪道昆:《太函集》卷89《辽东善后事宜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⑨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45《选举考(续)》,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⑩ 顾养谦:《冲菴顾先生抚辽奏议》卷6《海道》,齐鲁书社1996年版。

⑪ 《明神宗实录》卷543,万历四十四年三月戊子。

⑫ 张萱:《西园闻见录》卷5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⑬ 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卷39,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5册,第703页。

⑭ 参见[日]荷见守义:《明代遼東統治体制試論——山東布政司との関わりをめぐる》,《人文研纪要》第37号,2000年。

他文献材料。如果再结合洪武二年(1369)北平行省成立之前明朝曾将北平府、真定府划归山东行省管辖的史实予以分析,<sup>①</sup>则洪武四年(1371)明军渡海进驻辽东后明朝曾将辽河平原的部分地区划归山东行省管辖的史实应该可以得到确认。然而,辽河平原的部分地区曾隶属于山东行省及洪武九年(1376)之后的山东布政司并不意味着辽东都司曾隶属于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sup>②</sup>因为无论是洪武四年(1371)设立的定辽都卫还是洪武八年(1375)以后的辽东都司,皆归大都督府及其后的五军都督府、兵部等中央机构管理,作为地方行政机构的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无权管理。那么,王朝制度的一般性规定与相关制度的实际运作是否存在差异呢?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令翰林儒臣、廷臣等纂修的《寰宇通衢书》告成。“其方隅之目有八。东距辽东都司,陆行为里三千九百四十四……自辽东东北至三万卫,马驿四,为里三百六十。西极四川松潘,陆行为里五千五百六十……又西南距云南金齿,陆行为里六千四百四十四……南逾广东崖州,水陆兼行为里六千六百五十五……又东南至福建漳州府,水陆兼行为里三千五百二十五……北暨北平大宁卫,为里三千六百一十四……又西北至陕西甘肃,为里五千五十。”<sup>③</sup>引文中三万卫与辽东都司、松潘与四川、金齿与云南、崖州与广东、漳州与福建、大宁卫与北平行都司、甘肃卫与陕西行都司皆为隶属关系。与此同时,史料未云“北距山东辽东”,仅云“东距辽东都司”。由此可见,辽东都司作为独立的行政区划并不隶属于山东布政司。

辽东都司既然从未隶属于山东布政司,那么该如何理解所谓“原系一省”的相关史料呢?笔者认为所谓“辽左旧隶山东藩司”、“山东、辽东原系一省”等,指明初辽河平原从州县体制向卫所体制转化的过渡期中曾经存在的州县隶属于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因为明朝最初在辽河平原推行的是其在明朝辖境普遍施行的州县、卫所并置的政策。正如将后来隶属于北平行省的北平府、真定府隶属于山东行省一样,将辽河平原新成立的州县隶属于其军需物资的供应地山东行省是非常合理的安排。

## 二、明初辽东隶属于山东的州县

既然山东与辽东“原系一省”指洪武年间辽河平原曾经存在过的州县隶属于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那么就有必要考察以下两个问题:(1)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曾经辖有多少个辽东的州县。(2)辽东的州县与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的隶属关系究竟持续了多长时间。上述问题可以归结为明初辽河平原州县的建置与废止的问题。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日学者在讨论明初辽东的卫所建置时往往涉及这个问题,但迄今为止相关研究成果仍然存在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首先,洪武年间明朝在辽河平原设置的州县只有辽东半岛南部的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以及设立不久即废止的辽阳、瑞州。至于辽东北部的开原、铁岭、沈阳,辽河以西的广

① 《明太祖实录》卷35,洪武元年九月庚寅;卷38,洪武二年正月癸亥;卷40,洪武二年三月癸丑。

② 明朝在成立之初曾推行行省制度,至洪武九年改行布政司制度。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06,洪武九年六月甲午。

③ 《明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九月庚申。

宁、锦州、义州等地，明朝从未设立过州县。解读辽河平原从州县体制向卫所体制转化的关键史料，是正统八年（1443）初次修成的《辽东志》所载洪武十年（1377）“革所属州县，置卫”。<sup>①</sup>天顺五年（1461）修成的《大明一统志》所载与此无异。<sup>②</sup>《明史·地理志》亦延续了这种说法但稍变其文：“（洪武）十年，（辽东）州县俱罢。”<sup>③</sup>中日学者对上述记载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张维华、和田清不加辨析地沿用相关记载，认为洪武十年明朝撤销了辽河平原的所有州县，悉数将其并入卫所；<sup>④</sup>清水泰次认为明朝曾在辽河平原普遍设置州县，至洪武十年辽河以东的辽阳与辽河以西的义州等州县大多被废止。<sup>⑤</sup>李晋华虽然因相关记载不见于《太祖实录》而对《明史·地理志》的记载提出质疑，但由于忽略了《明史》修纂者依据的是《辽东志》、《大明一统志》，遂以为清代中叶修成的《明史》不可尽信而以“不知何据”加以否定。<sup>⑥</sup>

笔者认为永乐年间奉明太宗谕旨开始纂修的《辽东志》<sup>⑦</sup>在史料价值方面并不比永乐年间改定的《太祖实录》逊色。然而，看似吊诡的是据《太祖实录》明朝于洪武六年（1373）在辽阳设立府县后“寻罢置辽阳府县”；<sup>⑧</sup>其后为广宁前屯卫治所的瑞州虽于洪武六年之前亦设有州县，但洪武六年即因不堪北元军队的侵扰而被迫废弃；<sup>⑨</sup>后文将会深入讨论的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则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左右才被并入卫所。这也就是说，《辽东志》所谓洪武十年“革所属州县，置卫”的记载看似荒诞不经。那么，该如何理解《辽东志》的相关记载呢？

笔者认为《辽东志》所谓洪武十年“革所属州县，置卫”指明朝在此年彻底放弃在东北地区建立行省的想法，下达在辽河平原推行不立州县、只设卫所的政策。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命群臣讨论屯田之法的谕旨透露了相关信息：“昔辽左之地，在元为富庶。至朕即位之二年，元臣来归，因时仕之。其时有劝复立辽阳行省者，朕以其地早寒，土旷人稀，不欲建置劳民，但立卫以兵戍之。”<sup>⑩</sup>“有劝复立辽阳行省者”表明曾有人向朱元璋建议在东北地区沿袭元代的行省制度。<sup>⑪</sup>然而对朱元璋否定这一建议的时间则不能拘泥于所谓“至朕即位之二年”，因为洪武五年（1372）六月明朝在明军控制的辽东半岛南部设立金州、

① 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第470页。

② 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25，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页。

③ 《明史》卷41《地理志》。

④ 参见张维华：《明辽东“卫”、“都卫”、“都司”建置年代考略》，《禹贡》第1卷第4期，1934年；[日]和田清：《明初の満洲経略》，[日]和田清：《東亞史研究（満洲篇）》，东洋文库1955年版，第287页。

⑤ 参见[日]清水泰次：《明代の遼東經營》，《東亞》第8号第1卷，1935年。

⑥ 李晋华：《明代辽东归附及卫所都司建置沿革》，《明史论丛》，学生书局1968年版，第31页。

⑦ 参见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序。

⑧ 《明太祖实录》卷83，洪武六年六月戊戌。

⑨ 《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

⑩ 《明太祖实录》卷145，洪武十五年五月。按：“其地早寒，土旷人稀”并不是明朝放弃在东北地区建立行省的唯一理由，试图以抽籍或垛集的手段化民为兵是同样重要的原因。

⑪ 无论是洪武四年的辽东都卫还是洪武八年以后的辽东都司都没有被明朝视作青州都卫、山东都司的派出机构，即从未被称作青州行都卫、山东行都司。上述史实亦从一个侧面显示出明朝曾有意在东北地区建立行省。

盖州、复州三个州县,<sup>①</sup> 洪武六年(1373)又在辽阳设立府县。因此,引文所谓“但立卫以兵戍之”的决定不能早于洪武六年。参照《太祖实录》将朱元璋的谕旨系于洪武十五年(1382),可知放弃在东北地区建立行省的打算,做出只设立卫所管理辽河平原的决定当在洪武六年至洪武十五年之间。在复原了相关语境之后,《辽东志》洪武十年(1377)“革所属州县,置卫”的记载就容易理解了。它指涉的是明朝于洪武十年颁布了在辽河平原废除州县,但“立兵卫以戍之”的政策。<sup>②</sup> 需要强调的是,洪武十年是明朝颁布推行卫所体制这一政策的时间而不是辽东州县被悉数废除的时间。

如果研究者综合考虑明朝于洪武十年决定在辽河平原推行只设卫所的宏观政策与洪武二十年(1387)之前辽北、辽西时常控制在北元军阀手中的事实,<sup>③</sup> 便能够对以下史料的简略记载做出相对正确的解读,即《辽东志》描述洪武二十三年(1390)设置的广宁卫时所谓“本朝废州县”以及清水泰次引以为证的《明史·地理志》记录洪武二十三年设置的义州卫时所谓“洪武初州废”,<sup>④</sup> 指涉的皆是废除元朝曾经设置的州县。这也就是说,除瑞州外,明朝从未在辽北、辽西设立州县,清水泰次认为明朝曾在义州设立州县实属误解。

其次,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个州县的废止时间并非洪武十年,而是洪武二十八年(1395)。如前所述,张维华、和田清认为包括金、复、海、盖四个州县在内的辽河平原的州县在洪武十年被悉数革除,张士尊、李新峰皆赞同此说。<sup>⑤</sup> 然而《太祖实录》中的四条史料提供了有力的反证。(1)洪武十七年(1384),“金、复、海、盖四州儒学(设)学正各一员”。<sup>⑥</sup> (2)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辽东开原卫军士马名广奏曰:“辽东二十一卫定辽等七卫已有都司儒学,金、复、海、盖四州已有州学。其开元、沈阳、广宁、义州亦皆名郡,学基尚存,遗碑犹在。宜建学立师,以复其旧。”<sup>⑦</sup> (3)同年七月,“敕辽东都指挥使司谨守边防,绝朝鲜国贡使。又命左军都督府遣人往辽东金、复、海、盖四州,增置关隘,缮修城隍。发骑兵巡逻至鸭绿江而还”。<sup>⑧</sup> (4)洪武二十八年(1395),“改辽东金、复、海、盖四州州学为卫儒学”。<sup>⑨</sup> 据以上四条史料可知,《明史·地理志》关于金、复、海、盖四州废于洪武二十八年的记载理应无误。<sup>⑩</sup>

通过上述对明初辽东州县的建置与废止的讨论可知,除了设立不久即告废止的辽阳府县及下面将会再度提及的瑞州之外,自洪武五年(1372)六月至洪武二十八年四月在其后整

①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丙戌。

② 海州、盖州、复州的废置时间在洪武二十八年,而《辽东志》将海、盖二州的废置时间系于洪武九年,将复州的废置时间系于洪武十年。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辽东志》的纂修者将籍民为军视作州县向卫所转化的开始。参见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

③ 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

④ 毕恭等修、任洛等重修:《辽东志》卷1《地理志》;《明史》卷41《地理志》;〔日〕清水泰次:《明代の遼東經營》,《東亞》第8号第1卷,1935年。

⑤ 参见张士尊:《明初辽东二十五卫建置考释》,《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李新峰:《明初辽东战争进程与卫所设置拾遗》,《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2011年。

⑥ 《明太祖实录》卷167,洪武十七年闰十月辛酉。

⑦ 《明太祖实录》卷225,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未。

⑧ 《明太祖实录》卷229,洪武二十六年七月辛亥。

⑨ 《明太祖实录》卷238,洪武二十八年四月乙亥。

⑩ 《明史》卷41《地理志》。

个辽东都司的辖境内仅有位于辽东半岛南部的金、复、海、盖四个州县。这也就是说,明初的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从未辖有整个辽河平原,仅一度领有辽东半岛南部的四个州县与甫立即废的辽阳。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引史料(8)“辽(东)故沿海属山东”的表述最为准确。

需要指出的是以下三点。(1)明朝于洪武六年(1373)之前在广宁前屯卫的治所瑞州设立的州县理应划归当时的北平行省管辖,与山东行省无关。因为洪武六年废弃的瑞州与北平行省相连,而与当时明军控制的辽东半岛之间的陆路交通却被北元军阀控制的广宁、锦州等地隔断。如果结合瑞州废弃时明朝将瑞州民众迁徙到隶属于北平行省的滦州境内<sup>①</sup>的史实予以分析,瑞州在洪武初年理应隶属于当时的北平行省。(2)永乐年间设立的无为州、自在州是与东宁卫、三万卫类似的羁縻组织,与常规的州县不同,这两个州隶属于辽东都司而不是隶属于山东布政司。<sup>②</sup>(3)洪武二十八年(1395)之后,辽东都司辖境内的州县已全部并入卫所,明代的辽东与山东之间不再存有任何隶属关系。

### 三、辽东与山东“名为一省”辨析

明代史料中还存在着辽东与山东“名为一省”的记载,即兵备金事刘九容所谓“山东与辽东名为一省”。<sup>③</sup>那么,所谓“名为一省”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表现是否揭示了明朝管理辽东都司这种非常规行政区划的实际运作呢?

在展开讨论之前需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1)山东与辽东之间的海上交通与所谓“名为一省”无关。因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与北直隶运送粮食、布匹、棉花等物资供给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北边重镇,<sup>④</sup>是明朝为有效运作北边防御体系而实行的宏观政策,与行政隶属关系无涉。具体到明代山东、辽东两地而言,山东除了供给辽东之外尚须供给宣府,辽东除了享有来自山东的军需物资以外还享有来自北直隶的军需物资。<sup>⑤</sup>至于山东、辽东之间的民间海上贸易属于商业范畴,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之内。(2)辽东生员于正统十二年(1447)至嘉靖十年(1530)赴山东参加乡试与所谓“名为一省”无关。因为卫所生员附于何处乡试并不取决于卫所所在地与乡试地点的隶属关系。如陕西地区的直隶卫所潼关卫的生员参加陕西的乡试,而嘉靖十三年(1448)之前山东地区的直隶卫所德州左卫等卫所的生员却远赴顺天府应试。<sup>⑥</sup>

那么,所谓辽东、山东“名为一省”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辽东都司属于非常规行政区划,因此在以布政司划分的中央机构中辽东都司通常被划归诸如户部山东清吏司、刑部山东清吏司、都察院山东道等机构管理。如前文所述,明朝最初并非没有在辽东设立行省的打算,只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个想法。于是,辽

① 《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

② [日] 荷见守义:《明代遼東統治體制試論——山東布政司との関わりをめぐる》,《人文研纪要》第37号,2000年。

③ 李辅等修:《全辽志》卷5《海运议》,辽海书社1931—1934年版。

④ 《明会典》卷28《边粮》。

⑤ [日] 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⑥ 夏言:《南宫奏稿》卷1《改便科举以顺人情疏》,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东都司被建构成一个不设布、按二司的非常规行政区划。正因为上述原因以及辽东半岛上曾经存在过的州县一度隶属于山东的事实,所以明朝在洪武末年设置的以布政司划分的中央机构中将辽东都司划归以山东布政司命名的相应机构管理。据《大明会典》,户部山东清吏司分管辽东都司,刑部山东清吏司带管辽东都司。<sup>①</sup>据《太祖实录》,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在都察院之下设置了包括山东道在内的十二道监察御史,但未曾言及辽东都司是否被划归山东道。<sup>②</sup>从现存明朝档案中辽东巡按通常被称作巡按山东监察御史<sup>③</sup>分析,辽东都司理应被划为都察院山东道的监察区。

其次,辽东都司的管理体制与南北直隶相似,不设布、按二司,其文职官员往往“寄衙”于山东布政司。辽东生员徐潮曰:“辽东学校见属巡按管理,与直隶提学事体相同。”<sup>④</sup>实际上,辽东不止学校管理与直隶“事体相同”,其不设布、按二司,分守道、分巡道等文职官员“寄衙”于相邻的布政司,亦与南北直隶的管理体制近似。辽东都司的分守道、分巡道往往由山东的布、按二司官员担任,但他们在辽东都司任职期间归辽东巡抚管理。<sup>⑤</sup>之所以依然采用山东布、按二司的官职,与《明史》概括明代南北直隶的管理体制时所谓“寄衙”的现象类似。《明史》云:“两京不设布、按二司,故督学以御史。后置守、巡诸员,无所属,则寄衙于临近省布、按司官。”<sup>⑥</sup>需要指出的是,辽东都司的文职官员“寄衙”于山东的现象不止限于分守道、分巡道,其兵备道、管粮通判、抚民通判、课税司大使等亦复如此。<sup>⑦</sup>正如正德年间兵科给事中屈铨所说:“辽东地方虽称边境,其分巡、分守等官以至钱粮吏役俱出山东。”<sup>⑧</sup>

其三,辽东都司的土地和人口在明代全国的相关统计中通常被并入山东布政司的名下。顾诚认为明代的耕地由军事、行政两大系统分别管理,因此洪武年间明朝统计全国土地数据时,作为行政系统的州县将所辖土地逐级上报至布政司、户部,作为军事系统的卫所将所辖土地逐级上报至都司、五军都督府。他推断《太祖实录》的明代全国耕地数额并不包括军事系统管理的耕地,《诸司职掌》的相关数据虽然包括军事系统辖有的耕地,但朱元璋试图

① 参见《明会典》卷14《户部一》;卷159《刑部一》。

②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9,洪武十五年十月丙子。

③ 参见[日]荷见守义:《明代巡按山東觀察御史の基礎考察》,《人文研紀要》第72号,2011年。

④ 夏言:《南宮奏稿》卷1《改便科举以順人情疏》。

⑤ 关于辽东的分守道、分巡道、兵备道“寄衙”于山东布、按二司的问题,张士尊已有所讨论,兹不赘。需要指出的是,张士尊将辽东都司文职官员“寄衙”于山东的现象进一步细分为“寄衙”、“寄职”、“寄禄”三种,而本文沿用《明史》的观点皆以“寄衙”视之。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

⑥ 《明史》卷75《职官四》。

⑦ 关于兵备道,张士尊已有所讨论,参见张士尊:《明代辽东都司与山东行省关系论析》,《东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2期。关于管粮通判、抚民通判,《四镇三关志》载:“辽阳管粮通判,弘治初年设,山东济南府列衙。”“广宁管粮通判,弘治初年设,山东济南府列衙。”“嘉靖四十三年,巡抚王之诰请设海盖抚民通判一员,山东济南府列衙”。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8《职官考》,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关于课税司大使,参见《英宗实录》卷159,正统十二年十月辛巳。按:《英宗实录》虽未明言课税司大使的“寄衙”问题,但参照上文所论及下条注释所引《武宗实录》可以推断,课税司大使亦不能例外。

⑧ 《明武宗实录》卷55,正德四年闰九月己巳。

“保住军事秘密”，下令将五军都督府辖有的耕地挂靠在湖广、河南等几个布政司名下。<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顾诚同时指出随着卫所制度的演变，“整个军事系统无复当年的体系”。<sup>②</sup>鉴于顾诚有“迄至明朝灭亡，绝大部分卫所仍然是同州县类似的地理单元”<sup>③</sup>的表述，笔者推测顾诚所谓“无复当年的体系”主要指中央机构层面的变化，即五军都督府的权力逐渐转移到兵部、户部等行政机构手中，都司、卫所最终与府州县一样归六部等中央行政机关管理。这也就是说，在洪武末年即已被划归户部山东清吏司管理的辽东都司在洪武末年之后虽然依旧作为军事系统管理原有耕地，但当明朝统计全国土地时，辽东都司的耕地数据经独立统计并上报到户部以后，理应被并入户部山东清吏司管理的土地中进行统计，最终以山东布政司的名义公布。<sup>④</sup>

与耕地统计略有不同，由于军籍是明代户籍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即使在洪武年间，辽东都司的军籍人口也没有保密的必要，然而留存在《太祖实录》中的洪武十四年（1381）与洪武二十四年（1391）的全国人口统计中并没有辽东都司的人口数据。笔者认为洪武十四年是明朝开始推行赋役黄册制度的年份，但当时的辽东都司仍处在与北元军阀纳哈出进行的战争之中，理应无暇从事人口统计。至洪武二十四年更造赋役黄册时，纳哈出早已归降，明朝没有理由将辽东的军籍人口弃之不顾。不止如此，洪武二十三年明朝将户部分为浙江、山东等十二部（按：即洪武二十九年之后的浙江、山东等清吏司的前身），<sup>⑤</sup>由此后辽东都司归户部山东清吏司管理的史实判断，自洪武二十三年起辽东都司理应归户部山东部管理。因此，在《太祖实录》所载洪武二十四年的全国人口统计数据中，浙江、山东等布政司名下的人口实际上指涉的是户部浙江部、户部山东部等中央行政机构管辖的人口。这也就是说，洪武二十四年的山东布政司的统计数据包括了辽东都司的人口。与此相应，洪武十四年山东布政司的人口数为5196715人，洪武二十四年的相关数据为5672543人。<sup>⑥</sup>后者比前者多出475828人，这个数字应该主要是洪武二十四年辽东都司的人口与山东布政司十年内新增人口的总和。

其四，在官修的全国总志《大明一统志》中辽东都司被附在山东布政司的卷次之中。在天顺五年（1461）修成的《大明一统志》中，纂修者采取了将明代直辖疆土按南北直隶与十三布政司依次论述的体例。与辽东都司被划归户部山东清吏司、刑部山东清吏司管理类似，纂修者将辽东都司列入山东布政司的卷次之中，与隶属于山东布政司的登州府、莱州府同在一卷。<sup>⑦</sup>受《大明一统志》影响，《明史》和《读史方輿纪要》等著作亦将辽东都司附于山东布政司之后。<sup>⑧</sup>然而辽东都司与山东布政司毕竟是互不隶属的行政区划，因此部分明

① 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② 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③ 顾诚：《明帝国的疆土管理体制》，《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④ 笔者认为《明会典》与《续文献通考》记载明代全国土地统计数据时所谓“十三布政司并直隶府州”中的“十三布政司”名下的土地，其实是户部以十三布政司划分的十三清吏司管理的土地。参见《明会典》卷17《户部四》；《续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

⑤ 参见《明会典》卷2《吏部二》。

⑥ 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40，洪武十四年十二月；卷214，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

⑦ 参见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卷25。

⑧ 参见《明史》卷41《地理志》；《读史方輿纪要》卷37《山东八》。



代著作拒绝沿用《大明一统志》将辽东都司附于山东布政司之后的做法。<sup>①</sup>

总之,所谓辽东、山东“名为一省”主要指作为非常规行政区划的辽东都司在行政、司法、监察等方面由户部山东清吏司、刑部山东清吏司、都察院山东道管理,其文职官员通常“寄衙”于山东,其土地与人口统计亦被并入山东布政司的相关统计之中。以上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明朝管理非常规行政区划的实际运作。

#### 四、明代地方行政的两种管理体制

早在1935年,谭其骧即已提出辖有实土的都司、卫所兼管军政、民政,具有地方行政区划的性质。<sup>②</sup>1986年,顾诚指出明代的疆土管理体制可以分为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sup>③</sup>两位前辈学者的观点为深入探讨明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如果辖有25个实土卫所的辽东都司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山东布政司,那么谭其骧与顾诚的上述观点将遭遇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明代史料中“辽东省”,山东、辽东“原系一省”与“名为一省”的辨析,证明明代辽东都司从未隶属于山东行省及其后的山东布政司,谭其骧、顾诚的观点依然是经得起检验的真知灼见,笔者拟在顾诚明代疆土管理体制论的启示下探讨明代地方行政的管理体制问题。

首先,明代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分为州县体制和卫所体制两种。笔者使用卫所体制的概念,是因为谭其骧已经指出明代辖有实土的都司、卫所兼管民政,而顾诚提出的军事系统和周振鹤提出的军管型政区强调了这种非常规行政区划的军事性,却不能涵盖其兼理民政的特质。<sup>④</sup>与此相应,由于卫所体制兼有行政职能,顾诚提出的行政系统无法体现常规行政区划与非常规行政区划的体制差异,所以笔者认为应该使用州县体制代替行政系统。

其次,卫所体制仅指在实土卫所中推行的地方行政制度。顾诚提出的明代疆土管理体制论是一个比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问题更为宽泛的理论框架,因此他所谓的军事系统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卫所。然而,正如谭其骧指出的那样,只有实土卫所才具有行政区划的意义,所以卫所体制与非实土卫所无关。<sup>⑤</sup>

其三,卫所体制与州县体制不包括五军都督府和户部。在顾诚的明代疆土管理体制论中,军事系统除了都司、卫所之外还包括属于中央机构的五军都督府,行政系统除了布政司、府州县之外还包括属于中央机构的户部。顾诚进一步指出行政、军事这两大系统各成体系、泾渭分明。<sup>⑥</sup>然而,正如笔者在有关辽东、山东“名为一省”的讨论中指出的那样,实行卫所体制的辽东都司在以布政司划分的中央机构中通常被划归诸如户部山东清吏司、刑

① 如王圻将北直隶、山东布政司置于第225卷,将辽东、山西、河南置于第226卷。参见《续文献通考》卷225、卷226。

② 参见谭其骧:《释明代都司卫所制度》,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52页。

③ 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④ 上述观点的形成得益于北京大学郭润涛教授的启发。此外,关于“军管型政区”,参见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页。

⑤ 笔者不认同“准实土”卫所的概念。相关问题,参见郭红、于翠艳:《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

⑥ 参见顾诚:《明前期耕地数新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

部山东清吏司、都察院山东道等机构管理，辽东都司的土地和人口在明代全国的相关统计中往往被并入户部山东清吏司所辖范围进行统计。这也就是说，在明朝大部分时间里，辖有实土的都司、卫所与府州县一样接受户部等中央机构的管理。因此，在讨论明代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时有必要将五军都督府排除在卫所体制之外。与此同时，作为中央机构的户部也应该与作为地方行政管理体制的州县体制与卫所体制有所区别。

需要补充的是，明代推行卫所体制的地方不止辽东都司，所辖卫所全部为实土卫所的万全都司、陕西行都司、四川行都司以及为数不少的实土卫所皆是推行卫所体制的地方行政区划。然而，有关明代地方行政的既有研究往往侧重于对州县体制的探讨，与卫所体制相关的问题没能赢得足够的重视。<sup>①</sup> 本文在关于辽东、山东“名为一省”的考察中已经涉及了明朝对实行卫所体制的非常规行政区划的管理机制，但对卫所体制与卫所体制下的区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则仍有待日后的努力。

〔本文责任编辑 宋培军〕

## · 书 讯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吕文利副研究员著《〈皇朝藩部要略〉研究》，32万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

该书是在《历史书写与藩部政治——〈皇朝藩部要略〉研究》基础上的修订版。该书第一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祁韵士和张穆进行了详细研究。第二章对《皇朝藩部要略》的成书背景及版本进行细节性研究。第三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史实考证，主要对“卫拉特”、“厄鲁特”进行了考辨，对内喀尔喀五部中的斋赛进行了史实考证，对外喀尔喀硕垒的两封信进行了考证和解读，最后对西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事件进行了研究。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探讨了《皇朝藩部要略》中“藩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并提出了“藩部体系”的概念。第六章是对《皇朝藩部要略》的评价。本书最后部分，编纂了清朝藩部大事编年，以时间为经，以部落为纬，全面梳理了各藩部与清朝发生关系的历史。

<sup>①</sup> 卫所制度的研究者亦对作为地方行政管理制度的卫所体制有所忽略。参见邓庆平：《明清卫所制度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8年第4期。